

行路·反思·增识

——西安研习营学习心得小结

鄭鵬飛 寧夏師範學院講師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很早就知晓这句古训，而且在很长时间内觉得其含义“自明”于己：不仅要在能在书斋里坐得冷板凳，而且也要多走出去接触社会、自然等书本之外的东西，以此来印证书中所言是否准确无误。但通过参加 2018 年暑假以“关中·外缘”为主题的西安研习营活动，我改变和更新了对这古语的体会和认知：“读万卷书”后，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还要“思万个 why”，即带着双向的质疑心态和批判眼光，来审视、反思所读所见。惟其如此，方可接近、达到“知行”（即“读书”与“行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在参加西安研习营之前，我已经数次参加国内知名高校组织的“研修班”、“暑期学校”等类似活动。或许是活动理念使然，或许是条件限制，这些活动都以校园内的专家授课和分组讨论活动为主。书斋内“思想的盛宴”固然迸发出许多学术智慧的火花，但没有机会到学校附近富于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走走看看，始终是一个遗憾。而西安研习营的活动就比较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西安研习营长达十余天的活动中，课堂内授课和外出田野考察大致各占一半的比例。这既让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分享海内外多位专家学者的治学智慧，同时也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走到野外，共同参与田野考察。8月2日—5日、7日，我们先后到陕西宝鸡、宁夏固原和西安市内文化景点进行了考察调研。研习营成员实地勘察了汉景帝阳陵及城阙，参观了周公庙和周原遗址及博物馆，在中国青铜器博物馆了解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工艺的发展过程；在固原近距离目睹了秦长城遗址、须弥山佛窟和姚河塬考古发掘现场；在西安参观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在这次研习过程中，师生共同研读有关资料，一起到田野现场踏勘、观察，不同专业的人们凝聚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讨论和辨析“关中·外缘”的历史文化命题。

我不仅在聆听名家讲座中博闻，而且还在田野考察中反思。在这个参观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一般的观光旅游，而是在有关考古专家和田野导师的指引下，带着问题考察参观，注意对比经典文献中的记载是否与实物遗址相符合，进而质疑既有文献和研究论著的相关表述，思考博物馆文物布局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对参观者的控制欲望；在参观几个博物馆的过程中，不少营员们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后，对解说词

予以学理分析，给我印象深刻。这就超越了一般理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是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介入知识与现实，重塑既有的知识体系、更新思考结构，而不是把自己大脑作别人知识的橱柜或跑马场，更不能被那些伪常识所蒙蔽。走到室外，在自然界、在古人活动过的地方思接千载，追问无数个 why，就是这次研习营给我的鲜明印象和重要启示。

这次活动还让我重新思考西安与固原文化关系、宁夏文学与关中秦地文化关联等问题。前几年，因着在陕师大读博，我有四年多，曾经屡次，大概是两个月一次，乘火车往返于固原和西安之间。由于是小城市，有限的几列火车都是在半夜抵达固原或发车，于是我就是夜行晨至或昏发夜至。在多次的慢节奏穿梭中，我对固原、西安两城联系的感受是一个较发达的老城市与一个较封闭的偏乡小城的关系，仅此而已。同时，我较少关注宁夏作家与关中文化、秦地文化的关系。在这次研习活动中，通过学习、交流，我开始意识到这两个城市之间在历史上有着密切联系，虽不敢名之为“双城记”，但二者在古代军事历史上的唇齿关系；西安作为中央都市对边陲城镇在文化、政治方面的辐射影响的流传，使得固原当今的许多语言、民俗现象与西安、关中地区密切相关。这启发我在研究宁夏文学现象时，要引入关中的影响视野，注意比较宁夏作家与陕西作家在创作特征方面的区别与联系。

而“增识”则主要得益于研习营中的耳濡目染。在多日听讲座、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领略了不同风格的学者专家的治学思路和授课风格，有的以史料扎实见长，有的注重文字资料与田野实物的相互印证……；有的在娓娓讲述中渗透自己的理论观点，有的善于调动听者思考，并“拉”其参与到讲解过程中。这些都给我以很大启发，我今后在学术研究、授课过程中要结合个人实际，积极借鉴他们的优势长处。在与来自两岸多地的不同学校、学缘背景的同学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我们不同的思考问题方式与角度、面对同一关注侧重点的差异等。大家在一起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有形无形中，就彼此交流了具体观点之外的认识问题、观察视域的优长与特色。

治学先治史。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而言，在与历史学专业的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了史学界严谨务实的学风，启发我今后在研究文学时要重视史实、史料对结论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可盲目跟风运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起码谈及有关文学史问题时，要注重有关史实的真实性，合乎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

总之，参加西安这次研习营收获很大。期望这个研习营接力棒能够接连赓续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中受益。我也希望有机会再参加这个研习营活动！